

## 儒学伦理对于日本敬语现象的影响力研究

周琛

(东南大学 日语系,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敬语是日本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语言现象,它是否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启示,并如何接受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在敬语意识上的影响,通过儒学在日本历史中的演绎过程以及日本敬语现象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两种坐标,特别关注伦理意识在其中的影响力,对此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发现:敬语现象既是日本引进儒学伦理并使之日本化的结果,又是它在日本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次特殊映照。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儒学伦理成为日本文化积淀乃至一种文化精神的过程,同时,佐证了敬语意识从肯定性的敬畏神格出发,到走向人的忠孝礼义以及泛道德,最后再回归恭谨即对于他者的尊敬待遇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日本敬语现象;儒学伦理;身分制度;敬畏;武士;日本化

**[中图分类号]** B82-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7)05-0026-09

语言表达是一种文化现象。日本的敬语是说话者怀着对他者的尊敬,随着具体情境确定对他人待遇表现的语言使用。日语中叙述同一事情时可以有几种表达方法,根据说话者、听者和话题者之间的年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等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对他者的敬意,此为敬语策略。敬语可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日本人在与海外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到日语敬语的特殊性。敬语的意识对其使用范围、表达形式产生直接变化。明治25年(1882)三桥要也首次对敬语全面分析,其后敬语研究出现了几次高峰。中国对日本的敬语研究多出自学习目的,主要集中于敬语的待遇意义及其使用。实质上,敬语作为日本文化中最重要语言现象,自生成即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启示。

意识形态(Ideology)是考察文化的一种整体性视角,存在于共识与哲学趋势中,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其内容相互联系及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伦理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意识是思维形态的意志,其发展首先来自于朦胧未分的一种客观性即风俗习惯,那是最初的共同意识;狭义的意识是关于对象的认知,它在自身当中分裂为主体和客体(《樊和平讲课录2007》)。伦理就是一个共同意识,风俗习惯总是伦理的根源。伦理,既是伦之理,即人伦、天伦之理,也是回归伦之理;伦理是客观与主观、实体性与主体性的同一。伦理意识就是对实体形态的一种认知。

基于此,中国传统的伦理型社会特别是儒家伦理在敬语的意识上有何影响值得研究。本文以敬语现象为载体,试图沿着日本历史发展的脉络,初步厘清儒学伦理对其影响及其变化,并希望使之成为关注日本文化精神的一种视角。

### 一、“绝对”敬语:古代日本君主制社会的“敬畏”伦理意识

日本的文字产生的时期比较晚,日本文字的产生是历史地并且直接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启发,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日本的语言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古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接纳、涵收、融合的过程中,儒学从交流到逐步渗入了日本文化的机体,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基因<sup>[1]27</sup>。同时,古代日本社会国家形成过程中以血缘家族为联结的作用巨大,与中国相似,血缘具有

**[收稿日期]** 2017-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独生子女时代老龄社会伦理风险的实证研究”(14BZX102)中期成果之一;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资助。

**[作者简介]** 周琛,伦理学博士,东南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

社会结构和阶级等级的意义。而维系日本早期社会秩序的是宗教习俗,即原始信仰的神道。这一时期敬语的主体是透过神话的纽带与之建立起亲属关系的天皇及其贵族阶层,敬语现象在产生初期呈现出与其社会背景相对应的信仰性起源特征,以及以敬语对象的所属阶层地位为规定条件的所谓绝对性语言表达的特点,因此,仅从中国儒家伦理对日本文化的渗入背景来看,在初期敬语现象中,绝对的敬畏意识的影响十分显著。

公元5世纪前,日本尚无文字,在以口传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原始的敬语。关于日本敬语的起源,研究者在文字资料近乎于无的情况下难以得到定论,迄今比较权威的是金田一京助提出的“禁忌起源说”和“美称起源说”,即人类源于对自然力和神灵的敬畏之情对一些词语产生了忌讳,禁止直接使用,同时,人类相信用赞美的语言来表述神祇祭祀的关联事物能带来好运,这样的语言逐渐发展形成了所谓敬语。根据日本的研究成果可知,受“言灵”思想和“禁忌”(taboo)意识支配,敬语发展到公元6—7世纪时在《古事记》等作品中已有所体现。到了奈良时代(8世纪末),作为敬语内容分类的尊敬语和谦让语在使用上已经定型。至平安时代(9世纪前后),敬语内容中又出现了“丁宁语”(礼貌敬语)的用法。此后,以这样的“三分法”为框架的日语敬语沿用至今<sup>[2]</sup>。菊地康人的敬语论说道:与听者无关,即不受说话者和听者归属范畴所束缚,只把话题者(問題の人物)的地位视为绝对因素,对该人物始终用固定的敬语模式来应对,这是绝对敬语的用法,也是身份敬语的体现。古代日本的敬语对象原初是古神话及与此相关的神祇崇拜,进一步发展后就是指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相连的天皇统治及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集团或阶层组织。该群体在这一时期居于当时君主制度的统治顶端,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拥有绝对的社会地位,因此,在敬语现象上表现为一种绝对的敬畏,这是来自于对等级的严格遵从,这种意识的形成显然与日本古代文化乃至文字产生的渊源,即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影响密不可分。

古代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制,统治阶层作为主流意识的主体,要求民众对其绝对顺从,二者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关系。这一时期成为敬语的生成及初期,研究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必须关注到三个方面研究:(1)原始社会时期母系社会的母神信仰,以及所谓女性语的存在;(2)汉文字传入日本后,儒家思想对它的影响;(3)君主制政权后,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被统治阶层加以利用,但仍保有原始的女尊男卑思想,是一种二者共存的特殊社会现象。由此可以推断,古代日本社会的伦理意识较弱,主要是“敬畏”的原初意识产生着最大的和最直接的作用。首先,日本原始社会时期有着母神信仰,在绳纹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境下,人是唯一的生产力,因此,对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感到敬畏,女性被奉为神灵顶礼膜拜。弥生时代后,日本列岛开始出现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雏形“邪马台国”,它的统治者“卑弥呼”就是事鬼神道、以妖惑众的“巫女”,她充当着神灵与人类交流的媒介。可见,女性在日本原始社会中始终处于引领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渐疏离于政治的中心,那些祭祀神灵的世界以斋宫、斋院制度保留下来。平安时代,女性在从事祭祀神灵活动中认为直言及与神事相关的事物可能招致灾祸,于是创制了一些代用语称之为“(斋宫)祭词”,其目的在于避讳,这种独特的用语可视为日本最初的女性语,这种用语并成为敬语的起源之一。早期封建社会,男性逐渐进入统治中心,在上层社会,女性被要求“慎言”不外露,言谈要含蓄、委婉、文雅,上层的贵族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特殊存在,在说话时往往特别关注自己与谈话者之间的身份关系,因而使用复杂的敬语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这在《源氏物语》《枕草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许多贵族出身的女性为了家族利益而采取政略婚姻,即努力嫁给天皇或者家族的政治盟友甚至敌人,因此必须迎合主流意识的标准,其家族也着意培养,以符合统治阶层对女性的各种要求,具备上述的女性魅力。同时,由于当时社会的男性交际以汉文、汉诗为中心,女性也就自然地难以掌握理性的汉语化语言。为了区别于男性用语,回避生硬难解的汉语词汇,当时的女性开始更多地创制并使用日本固有的感性化的所谓“和语”词汇<sup>[3]</sup>。另一方面,日本文字产生的时期比较晚,在口口相传的文化遗产过程中原始的敬语由此产生。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公元6世纪汉文传入日本,

最初使用范围限于天皇及皇室贵族,以及儒学学者和佛教僧侣掌握。日本第一部《日本书记》(成书于720年)记载到,中国儒学经典是于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日本,这一结论从保存至今的、被认为写于公元5世纪的日本文章中得到证明。然而,日本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则是公元6世纪的事情。据《日本书记》记载,百济国王曾派遣五经博士来到日本。五经博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百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百济的五经博士就是仿照汉朝建立的,此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日本以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为桥梁,逐步扩大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sup>[127]</sup>。儒学传入日本,是在中日两国文化存在很大势差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儒学建立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是发生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公元5—6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当时的日本却刚刚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原始的宗教文化仍占主导地位。根据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存在势差的文化相互接触,先进的文化就如同水流一般,流向较为落后的一方。而后者对前者的接受,则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只有当人们发现先进的文化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传入的先进文化才能在新的土壤中生根。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接受的速率不同。中国儒学形成时,日本仍处于野蛮社会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儒学传入日本时,原始的宗教意识仍然在日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很难对儒学思想产生共鸣,即使少数学过儒学的上层贵族,也更为重视利用祖先崇拜的宗教机制作为统治工具,加上当时日本民族还未创造自己的文字,刚刚学习汉文,增加了理解儒家思想的困难,因此,儒学传入日本初期很难发生广泛的影响。但是,正因为儒学是日本社会处于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交接点,即在日本文化形成的时期传入的,所以它直接参与了日本文化的创造,并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因子。

再看作为初期敬语主体对象的古代天皇及其统治阶层的出现境况。日本“天皇”的称号就源于中国。天皇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的确立是在大和朝廷时期,当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氏(自治部落)也透过神话的纽带与之结合在一起,起初多称“王”、“大王”,至后期始称“天皇”,这一时期大约是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的推古女帝在位期间。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初实行“冠位十二阶制”,制定《十七条宪法》,开始大规模地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伦理制度,初步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原则,这可视为古代天皇制的起点。大化改新(645年)后大和朝廷的历史结束,开启了以天皇为君主的古代专制君主制的新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地学习中国,使得日本人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人类文明,大大加快了民族发展的步伐。圣德太子主张德治论,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直接影响。“冠位制”中不用世袭而用德能表示官阶的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族贵族势力,官阶名称也以儒家德目命名,其顺序是德、仁、义、礼、智、信,每个德目再分大小两阶,这是圣王思想的直接体现。而为了说明君权的神圣性与圣上行,他又引进了中国的天命观。与中国一样,天、天命都是血缘的人格化与普遍化。天命又不是绝对的,于是他引进中国的仁政、德治思想。《十七条宪法》训导说:“凡将治者,若君如臣,先当正己,而后正他。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以不自正者,不择君臣,乃可受殃。”(《日本书记》)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德配天的思想。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层作为意识的主体,要求人民对皇室绝对顺从,并尊重贵族、讲究门第贵贱,由身份的尊卑来决定各自的社会生活方式。在这种强调地位差异的社会环境中,语言也成为被约束和要求的一种手段,即仅限于神灵、皇室、官方用语。天皇自称是神的化身,为了表现皇室的高高在上,出现了语言表达上的绝对敬意。这一时期作为敬语的生成及初期,其特征就是社会的地位等级对敬语使用起着绝对的影响,敬语的使用由门第地位等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在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这种上下关系是绝对的,有着敬畏的伦理意识,它把敬语指向了固定的方向,不论场面人称如何变化,对固定人物所用的敬语是不变的,因此称之为“绝对”敬语。“绝对”敬语有“尊敬语”和“谦让语”两个种类。比如《万叶集》记载的歌谣中,神和天皇就用“尊敬语”来叙述自己的动作和事情,进一步抬高自己地位,用“谦让语”来叙述臣子的动作和事情,更加压低臣子的地位,表现出绝对的上下关系。也可以用“尊敬语”中的接头词来举例:在“大”(オホ)的词群中,有皇太后(オホキサキ)、祖父(オホジ)

等用于称呼年长者、老者,有着自然尊称的意识;大神(オホカミ)、大殿(オホトノ)、大王(オホヌシ)、大君(オホキミ)等尊敬用语;“御”(ミ)的词群中,有宫(御屋、ミヤ)、朝廷(御门、ミカド)等。显然,这样的尊敬语在广义上一般是作为以天皇及皇族和神佛为中心的敬语来使用的。

事实上,作为“绝对”敬语内容的“尊敬语”和“谦让语”的“敬”“让”词汇本身,也是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敬谦词缘起较早。自阶级社会前期起,敬谦辞的运用就日渐频繁,战国时期已相当发达。究其原因,儒学的兴起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祖先崇拜的兴盛以及亲缘观念的增强也有一定作用。春秋时期,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利于在政治上强化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乐记》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等级制度加上“礼”的意识,阶级社会愈向前发展,等级制则愈完备。等级制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得力武器被制度化、法律化。《左传·僖公十一年》说:“礼者,敬而已矣。”“敬”乃“礼”的核心,示“礼”就要示敬。“礼”之本在于等级贵贱之分,而过于强调“分”也易于走向极端,为此又提出“让”。谦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左传·襄公十三年》说:“让,礼之主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无辞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说明,儒家的“礼”不仅要求人们恭以待人,还要求谦以待己。《礼记·曲礼》中明确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若仅受人之“敬”而不自“谦”,就会犯傲而招损,只有敬人的同时谦己,扬人的同时抑己,才能受益无限。此外,祖先崇拜也使敬谦辞新增了许多内容。祖先崇拜使人们对亲缘关系格外看重,渐渐产生了亲疏不同、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尊卑不同的伦理观念,体现敬疏谦亲、敬外谦内的大量亲属敬谦辞出现,如令公、贤尊、愚伯等等。然而,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在古代日本社会“绝对”敬语的“尊敬语”和“谦让语”中却只是讲究“敬”而无示“礼”,“谦让”的对象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日本的敬语现象对于有些概念及内涵的吸收也是浅尝辄止。这说明,早期日本只是照搬中国儒学经典以及注疏典范,缺乏创造性的理解与借鉴的意欲和能力,流于模仿,没有产生日本的特色,也未能使儒学潜入日本文化的底层。同时,其影响范围与层次也仅局限于皇室、贵族和官僚阶层,其接受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实现政治权利,与统治阶层的实际行为发生严重背离。因而,儒学的影响仍处于日本文化的表层,未能成为深度的文化积淀。同时也可以说,日本上古时代尚未形成伦理意识。另一部《古事记》(成书于712年)中的文章也仍然保持着一种原生时期的原始性和朴素性,没有多少伦理教化的痕迹。《古事记》记载了古代日本文明摇篮时期的日本文化的原始形态。在这个时期,《古事记》中有着母系氏族社会所遗留下的女尊男卑,同时也存在逐渐形成中的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两者显示着一种共存的关系。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是敬语现象的生成及初期,其特点就是“绝对”敬语的使用,而主要背景是一种基于“敬畏”的原初伦理意识,它既是对于神祇的原始崇拜与敬畏的伦理意识,也是对于天皇及贵族阶层的君主集权制等级的遵从,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是历史地并直接地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敬畏意识的影响。从平安时代后期开始,出现了“相对”敬语,“相对”敬语重视表达对听话者的尊敬,会根据场合、人称来选择使用敬语,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也同样出现了重在表达对听话者敬意的敬语使用方式,这说明敬语已经表现出多重化、复杂化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应归结于封建性身分制度的细化。

## 二、“相对”敬语:近代日本集团主义社会的“忠孝—礼义”伦理意识

当日本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直至近代的江户时期以后,其社会形态逐步形成了以“家”父长式集团主义为主要形式的一种共同体社会,即由血缘固化的天皇中心的君主制统治转向非血缘性群体组成的“家”父长制的幕藩中央集权体制,它以身份制度来约束和规定个体与共同体社会的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武士阶层是以武力推翻了天皇君主制,在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特别需要继承儒家道统以正名,强调臣对主的忠,而在非血缘性群体的彼此之间则需要遵守基于身份制度及人伦辈分的伦理规范要求。这一时期敬语现象的特征是“相对”敬语的使用。“相对”

敬语是指话题者即使是同一人,也会根据与听者不同的关系,即通过判定说话者和听者的归属范畴,确定是否对其使用敬语,且所使用的敬语因此也相对发生变化的敬语用法。在“相对”敬语中,即使是对长辈、对上一级的言行,有时也不一定使用尊敬语,需要根据敬语对话的语境不同而发生变换。比如,原则上对上的言行应使用“尊敬语”,有时却需将此转换为使用“谦让语”。而对与自己同一归属范畴的长辈也是一样,在对话时有时可能也会使用“尊敬语”,但在与其他范畴的人说起自己的长辈时,则不可使用“尊敬语”。相反,与长辈、与上一级谈起其子女,或在长辈、上一级面前与其子女说话时也应该使用敬语。由此可见,“相对”是近代直至现代日本敬语的特色之一,也就是说,仅从说话者与话题者的关系来看也许应该使用敬语,但最终是否使用则必须根据与听者的关系来进行判断,这与古代的“绝对”敬语显著不同。如果说社会形态及其主体的变化对于语言的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日本的敬语现象由“绝对”走向“相对”,具有复杂化的趋向以及超越阶层地位的色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探究与其相关的敬语主体,即新生的武士群体与新兴的町人阶层的出现,加之社会背景的变化,即镰仓、室町幕府时代与江户幕藩体制时代的身份制度,以及后期变化了的人际关系,关注其中儒家伦理如何产生意识的影响,就是本节展开的重要维度。

在镰仓、室町幕府时代,武士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其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武士阶层与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并行,组成社会统治体制的二元结构,共同维护着日本近代继续以等级序列为目标的社会秩序,并成为那一时期实质的社会意识主体。“武士”一词也是从中国传入,在日本它可以理解为兵、侍、武者等近义词,三者都反映了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12世纪时统称为“武士”。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开始丧失支配权,随着以“国”(地方诸侯)为单位的军事群族崛起,获得政治权威和土地控制权的新制度出现,新兴的武士集团登上了政治舞台。武士集团的形成和以天皇为首的集权制瓦解及庄园制建立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由于庄园的普遍建立,庄园之间为扩大领地的矛盾日益增多。庄园主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诉诸武力,部分庄民被武装后成为职业武士。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下的行政与保护机关衰败,为遏止地方动乱,部分“国”司贵族逐渐变成武士阶级,为现有的权威体制服务。随着军事行动增多,新生的武士们有渐成集团的趋势,大都簇拥在某一领袖人物之下,贵族们渐渐不敌武装上的横暴而只能加以依靠,于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武士获得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最终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武士集团的结合有两种关系,即家族和宗主,严格纪律和绝对服从成为彼此构成“主从关系”的第一要务,形成了尽忠义、奉公及报恩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伦理观念。

武士阶层掌握政权后,为保持其武士身份的统一性,重要一点就是坚持以“主从”关系来维持秩序。主从关系是将军与家人之间的主与从,称为御家人制度即家臣制度。“御”是尊敬语的使用表达方式。在御家人制度中,将军处于主从关系的顶端,中间是称为侍的御家人,底层还有家子等等。这一制度原本是私人间的主从关系,镰仓幕府政权成立后演变为正式的国家制度,并且渗透到中央地方各角落,形成了一个统治的格局。这一制度构成了幕府政权支配体系的主干,有力地巩固和稳定了武家政权及其统治秩序。武士集团是相对封闭的集团,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主从关系之外,就是家族关系。因此,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观念便是对主君的“忠”和对亲长的“孝”。武士的忠孝与中国儒家有所区别。就“忠”的规范看,经典儒家认为君臣关系不是单方面的绝对义务,而是双向的具有条件的所谓君惠臣忠;在武士的主从关系中,最初“忠”也不是臣属对主君的单方面的绝对义务,而是以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带有某种契约性质。同时,由于武士与君主间的主从关系常常是世袭的,彼此间也有情的关系,由此而形成超功利之无条件的“忠”。不过,这种情归根到底是以往“恩”的积淀。父权的强大是武士家族关系的特色,父亲在家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于是便有“孝”的要求。在武士道德中“忠”与“孝”往往也发生矛盾,处理矛盾的方法常常是“孝”重于“忠”。但在镰仓幕府后期,由于没有土地用于赏赐有功家臣,所谓报恩与奉公的机制瓦解了,封建主从关系就此破裂,幕府统治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天皇及公卿贵族提出倒幕运动,即日本近代史的“建武中兴”,

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其口号却是“大义名分”,即要求懂得尊卑,听命于天皇。这与朱熹朱子学的理一分殊、君臣之道是一致的。然而,大义名分宣扬的是效忠天皇的君臣之道,并未成为政治的主流。原因就在于“公私”观念的双重标准,在武士政权中公与私是相对的,御家人对于将军是“私”,但对于家臣却是“公”,“私”对“公”要尽忠奉公,但这主要针对所属范畴的上级,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这是日本传统家族式集团主义要求的必然内容。实质上,武士政权和天皇权力有着两套不同的体系,奉行着不同的公私理念。“大义名分”在江户时代再次为德川幕府所强调,但却弱化了对于天皇的效忠,这也切合了德川幕府初期的日本社会现实<sup>[4]</sup>。

德川家康以武力统一日本,篡夺了其主君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成果,建立了江户幕府(1603)于是,他在思想理论上面临两个严峻的课题:一是论证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二是防止这种行为的继续发生。对此,德川家康借鉴了中国儒家理论的天命观去论证其行为的正当性,即他并非以武力取得天下,而是“天”的选择。但如何中断这种“下克上”的现象,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以论证现有秩序的神圣性。在当时的日本意识形态中,唯有朱子之学适应了这种需要。朱子之学的“天理”不仅具备人伦的神圣性,而且具备了自然的客观性、必然性,使“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具有至上性、绝对性、神圣性,即人们只有遵从、维护现有的秩序才是“存天理”。至此,朱子之学在日本逐渐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于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便有了严格的区别,这就是中国的“五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日本近代社会的阶层更加细化,在既有的皇室及贵族的上流阶层以外,制定出土、农、工、商以及秽多(贱民,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身分制度”,于是便产生了等级身份道德,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武士道德,即“武士道”。“武士道”的形成与变迁始终与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维护武士政权的合理性与有序性,江户幕藩体制也强调“主从关系”,这就需要比中国更强调封臣对封主的“忠”,在忠孝观上特别注重“忠”,并认为,“忠”“孝”二者不可兼得也,舍轻而取重也。重,就是指君国大事的“忠”。江户以后武士的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武士从战斗员到作为最高等级的士,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其义务改变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主君尽“忠”;二是维护和实践人伦之道,即所谓儒学化的武士道理论<sup>[160]</sup>。由此,具有儒家重要特色的朱子之学就在日本由上而下地建构了一种“家”长制的纵式等级社会结构,要求各阶层各得其所,以各安其分为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说文解字》释“伦”曰:伦,从人,仑声,辈也。伦即辈意,辈即辈分,引申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就是所谓伦份。伦,是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份,即是在这种地位上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所谓的伦、人伦,不是指一般的人际关系,而是结构化了的的关系,它以宗法等级为内容。伦不同,份即权利义务也就不同。日本接受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观念,与其特殊的境遇和文化机制结合,形成“本分”的观点。孔子释“礼”时,以八个字来概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否则便是“礼”的僭越。归根结底就是教化如何守本分、守秩序的传统。在中国,可以透过“礼”即不同的仪式、礼节、不同的行为方式把各种各样的人区分开来,实现礼教的秩序。日本完全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即使是同一人,只要地位变化,礼节(如敬语使用)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日本近代“家”族家长制集团社会的重要实质,就是伦与份的规定。本来,儒教的秩序原理是一种上下式关系,其社会结构应当是纵式的,但是,德川时代却产生了中间形态的“家”,即作为血缘家族的“家”与君主的“家”之中间构造的“家”。它一方面是家族单位,另一方面是统治体制的中间结构和功能单位,而且,它拟化为扩大的“家”。“这种扩大形成的‘家’,可以说是从德川时代直到现代日本集团文化的基本形态”<sup>[185]</sup>,这种扩大的“家”不是以“孝”的原理,而是以“忠”的原理维持其秩序。这种扩大的“家”的结构及其忠诚原则产生了强化集权体制的幕府、与维护分权体制各藩之间的平衡政治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身份制度。在武士社会中,所有级别的集团都是扩大的“家”,灭私奉公的忠诚是其内部的道德准则。在家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作为个体的人并不存在;而在社会与家以外的人面前,他们又变成家族集团主义者,显示出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存在价值。这种扩大的家族主义的传统,使日本人有着一一种强烈的



集团归宿意识和对该集团的忠心。

江户中期以后,商业繁荣带来了商人阶层的兴起,即武士阶层衰落,町人社会兴起。同时,不同身份阶层的流动性及不安定性也增强了。这使得日本社会开始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横式发展,初步形成了趋于近代市民社会的讲究礼仪与追求平等关系秩序的伦理教化的新倾向,日本近代社会由此获得了一种纵横保持平衡的发展。而这其中儒家伦理的影响也至关重要。町人即商人,是日本传统社会的重要构成。作为封建经济的依附者,町人道德受武士道德的影响较深,他们甚至把武士的等级身份道德移植到商人社会中,把雇佣关系和家族关系也说成是君臣关系。基于集权与分权体制的并行情况,在江户中期的元禄时代,城下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更建立起一种以血缘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秩序或经济共同体。大量的人口开始在城市集中,人们开始与不熟悉的人交往,于是就需要平等的人际关系秩序。由此可见,进入商业社会后,身份制仅仅成为一种原则,平等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已经产生并不断加强<sup>[1]103</sup>。于是,除了某些有直接关系的人外,陌生人之间产生了平等的人际关系秩序。

可以认为,日本近代社会的总体构造是“家的联合”,即“家”的联合体,自身具有作为大“家”的性质及意识:其顶端是作为总本家的皇室,由此形成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整个社会以此为原理被一元化地组织起来。在此“家”的理论和模式基础上形成了纵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并影响至今。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的全貌就是一整套机构与集团的纵式系列。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日本不仅是纵式社会,从德川时代开始纵式与横式的日本社会结构已经巧妙地协调起来,也形成了一种既是集权又是分权的政治体制。在彻底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基于“忠”的君臣关系和基于“孝”的家族伦理上下级关系,社会结构形成一元性的“纵式”秩序,而欧洲社会建立的是以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为起点的市民社会,由此形成民主主义的“横式”社会结构。日本则具有“纵”和“横”两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并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在这里,“纵式”的社会结构,是指在集权政治体制下以“忠”以及“义”为原则的扩大的家族主义构造,而“横式”社会则是指各藩并列并存于町人形成的町人社会,以“礼”的运用来适应另一秩序的需求。当然,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纵式结构是日本基本的和根本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的敬语开始有所简化,产生了“侯文体”(官方文体,也称官话)。敬语已走出皇室,成为“国家”的官方用语,体现了敬语新的价值和功能。于是,具有超越阶层地位色彩的“相对”敬语趋于普遍。随着历史的新进程,敬语进一步进化,展现出具有社交性或多样性的新表现特征。

### 三、“交际”敬语:现代日本公司型社会的“泛道德—恭谨”伦理意识

日本的历史经过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发展、二战后的重建而进入现代社会。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带给日本一个重要的变革,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认识、自我的设计而完成的现代化社会建构。在此过程中,日本学习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将之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影响巧妙地结合,运用到现代社会体制的建构中,从而对于现代日本所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所谓公司型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方面,日本儒学与日本文化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性。儒学从根本上是封建主义的,日本儒学体现的是封建主义精神,它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经历了一个冲突对抗、官方化和成为文化积淀的过程。而现代日本社会的公司型发展模式依然遵循传统的集体主义及忠诚精神,这也可视为儒学的日本化、现代化的好例证。同时,现代日本社会中敬语已经不是以社会阶级、身份关系为基准,而是重视不同场域中相对应的人际关系并区分使用,内含着利益考量。即使对同一个人,根据场域可用敬语,也可不用敬语。而且,现代日本人通过自如地使用敬语,遵从约定成俗的语言规则以显示教养,以此维持社交上的关系,或者以此结成新的有利于自己的人际关系。因此,现代敬语又称为“交际敬语”,这是一种具有场域性特征的多样化的敬语现象。

明治维新(1868)是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起点,它不仅使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解体,也使传统的

文化道德秩序瓦解。明治维新的根本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在文化上,明治政权倡导文明开化即西化,部分地开展了对儒教的批判。这一时期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批判以儒学为主的意识形态,如引进了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批判儒学克己的禁欲主义,引进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说,提倡独立自主,批判儒家纲常道德。然而,两种文化的撞击与冲突必然会导致精神失重、价值倾斜,这种现象首先集中体现在最敏感的伦理道德领域,引发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于是,开始出现了向儒家伦理回归的趋向,在这一时期天皇重新获得了最高权力,日本近代天皇制体制得以定型化。二次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由此使学者研究其成功模式而提出了新的概念,即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儒学的部分价值观、伦理已凝结为日本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成为一种深层的文化积淀,儒学的影响已经由文化的表层走向文化的深层,可以说,儒家文化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重要文化力。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了自己的“神格”,制定了“一切国民在法律下平等”的现行宪法。事实上,明治维新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涌进日本,使日本人在个人权利与个体意识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考察,在西方文化主流或文化主体中以个人主义为基调,强调个体实在、个性、以及个体的整体性与独立性。特别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个体自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种个体自我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个人感”的增强,即个体社会独立性增强,个人内在世界私有化和复杂化。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摆脱了(社会)自然的联系而成为独立的甚至是彼此分离的个体,社会的联系变为个体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从而提高了个体自由的尺度,使个体有可能进行选择。近代西方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的文化精神形态,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相对于此,日本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比较特殊,在一个较封闭与强调一致性的社会生活中,受到顾虑他人的意识支配,很难确立自己,即具有自我的不确实感的特点,它容易产生他人中心主义倾向,表现于人际关系上的顾虑和客气。一方面,这个特点的消极方面可以透过集团主义的机制加以克服,因而导致服从、依赖的倾向,甚至一度产生了极右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日本人更关心于保持自己的柔性的认定性,以此来确保自己的集团从属性。因此,日本文化是把人作为广阔体系中的一个局部加以认识,即一个种类或群体,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当然,这样一种个体意识在日本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已经逐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性和整体性,也呈现出部分地注重个体价值、个体独立的趋向。

日本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是追求市场利益的结果。日本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表现于日本的经济模式就是一个家族式企业的模式,无数的公司构成了社会,即一个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日本引进儒家伦理,正是因为它契合日本民族的特性。儒学的精神是一种泛伦理主义、泛道德主义的精神。之所以是泛伦理主义,就是因为它把一切关系都看成或设计成家族关系或家族关系的扩充,即准家族的关系。而泛道德主义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当成是家庭成员。于是,日本社会便以道德为绝对的价值取向,作为制定一切的标准,并由此衍生出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日本儒学是对中国儒学的移植,它同化、改造、选择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使之日本化,然而其基本精神并未改变<sup>[1]260</sup>,家族式企业模式既是儒家伦理影响的明证,又是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今天的日本经济似乎有许多地方源自幕藩体制下武士阶级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我认为,从文化人类学来看,日本大企业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幕藩体制下的藩。”(梅棹忠夫)藩与日本的企业相似之处颇多。藩与藩士之间的关系是永久雇佣制,藩在整个人格方面管理藩士,而藩士则对藩抱有忠诚心。日本人对公司在情感上仍延续了传统的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观,职员与公司之间具有同生死、共命运的意识,所谓“亲如一家”,形成一种“家”的氛围。日本的公司职员可以称为现代“武士”,个人自觉维护集体的整体性而尽量不处于显眼的地位。因此,在儒家伦理的背景下,日本人在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集体感、忠诚精神、敬业精神,是日本人重要的劳动道德,也是儒家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结合点。于是,在家族式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自然地就产生了基于亲疏不同、内外有别的敬语使用现象,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家”(企业)的秩序与利益。

同时,作为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社会,一般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受经济利益或恩惠授受关系的支配和左右,可以说,它表现于日本人社交性活动的各方面,“商业敬语”最具代表性。此外,在许多场合敬语使用也是由于公共场域的社交礼节、礼貌或为了表现自己的教养和体面。这样的基于公私场域及关系而产生的敬语现象,通常在外交、讲演、集团活动、红白喜事的典礼以及社交信函中表现居多,这说明现代“交际”敬语的人格性越来越清晰。正如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敬语方针”(1952)所指出的,现代敬语的发展趋向产生了必然变化。(1)迄今为止的敬语承袭旧时代的发展过分繁杂。敬语应纠正误用,向平易简朴的方向发展。(2)过去的敬语主要基于上下关系,而今后敬语应立足于相互尊重,尊重个人的基本人格。(3)在女性语中存在过度使用敬语或美称的现象(如过多添加“お”),希望通过女性自身的反思和觉悟使之逐渐净化。(4)在商业方面,过去由于错误理解服务精神,使用过高的尊敬语或过卑的自谦语现象极为严重,易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人格尊严。因此,传统敬语已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部分谦让语成为恭谨语,用以表示郑重的礼仪性,并且使用频率相对上升<sup>[5]</sup>。

概言之,日本的敬语现象既是儒学伦理在日本被引进、涵收、日本化的影响结果,又是它在日本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种特殊映照。通过对此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儒学伦理在日本成为文化积淀、一种文化精神或文化力的过程,无疑也就佐证了日本的敬语意识从肯定性地敬畏神格出发,到走向人的忠孝礼义以及泛道德,最后再回归恭谨即对于他者的尊敬待遇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轨迹。

#### [ 参 考 文 献 ]

- [1] 樊和平. 儒学与日本模式[M].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
- [2] 辻村敏树. 敬语史[M]. 株式会社大修馆书店, 1971.
- [3] 远藤织枝. 女性语言文化史[M]. 学阳书房, 1997.
- [4] 王猛. 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大义名分”与公私观念[M]. 黑河学院学报, 2015(6).
- [5] 堀川直义. 敬语指南[M]. 明治书院, 1984.

(责任编辑 刘 英)